

第一章

初创：热情大爆炸

第一节 股市序幕的拉开

第一片“梧桐叶”

在深圳，一位股民拿出一张编号第一的股票，自称是“新中国第一张股票”；在武汉，有人展示出 1981 年武汉金融信托公司发行的股票；在沈阳，人们传说“金杯”是新中国最早发行的股票；在广东，有人保存着 1984 年 6 月广东佛山市信托投资总公司发行的第一期股票……。新中国股市只有十几年的历史，居然冒出那么多号称自己是摘取第一片“梧桐叶”的人，真是“满地梧桐堆积，不辨龙蛇”，让人莫衷一是。然而我们不会从纷乱的“号称”中起步，历史与考古是不能完全划等号的，长江的源头是沱沱河，而不会是什么地下水，第一张股票，只能是开启股市幕布的那一张，为此，我们将从影响、公开与合法的角度去界定新中国股市的起源。

在中国股民风起云涌，上市公司已逾千家，股市人头攒动热火朝天的今天，我们回首去造访历史，不禁充满苍凉寂寞之感。因为建国以来第一片“梧桐叶”，悄无声息地飘落在改革开放的大地上时，就连目光敏锐的有识之士都没有察觉。那些拾起她的人，对她并不了解，有人讨厌地扔进了废纸篓，有人

失望地把她撕碎，也有人干脆封存箱底久久淡忘。中国的股票，在80年代，是一个真正的“灰姑娘”。

知识界听到“灰姑娘”轻盈的脚步声是因为那样一件事：1986年11月份，世界上最大的证券交易所——纽约证券交易所主席约翰·凡尔霖先生来北京访问，在中南海与邓小平同志谈话间，美国客人向邓小平赠送了一件礼品，一个精美的小盒子，里面是一枚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所徽，凭这枚所徽可以自由出入纽约证交所。当时在座的中国人民银行行长陈慕华代表邓小平回赠客人礼物，那是一张绿色的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的股票，股票印制精美，上面盖有公司董事长的印章。没想到在改革开放才6年的社会主义大地上已有了股票，约翰·凡尔霖先生吃惊地望着这片新中国的“梧桐叶”，同时为自己成为持有新中国股票的第一位外国人而兴奋。他当即提出要参观中国的证券交易机构，那时所谓的股票交易市场还只是在上海的一间12平方米的小屋，还只能称为股票发行所，根本没有交易，所以美国客人的要求被婉言谢绝了。

但巨大的好奇心迫使约翰·凡尔霖先生再次提出请求，而且他有一个充足的理由：因为他惊讶地发现这张股票上股东的真名实姓不是他，而是“周芝石”。照理将股票送给别人，理应在股东一栏写上别人的名字，而当时不知是对股票所有权缺乏认识，还是为了股票的真实可信，居然没有想到填上凡尔霖的名字，填上的却是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副行长“周芝石”的名字。“周芝石是谁 我是凡尔霖啊！”当美国客人提出困惑时，中国解释说，这是为了保证股票有效才印上周芝石的名字。“我的股票就要用我的名字，我亲自去上海更名过户。”凡尔霖固执地要求。这是去看看中国股票交易所的最好理由，面对客人的固执和真诚，有关部门终于同意他踏进上海静安寺

附近的那间小屋。

凡尔霖一抵上海，第二天就要去办过户手续，其随行人员提出要警车开道，上海方面有些为难，按规定，国家首脑才能用警车，后上海警方提出凡尔霖先生花2000美元租借警车开道。这样，凡尔霖于1986年11月24日下午1点，由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行长李祥瑞陪同，“自费”来到了新中国首家证券交易部——静安证券营业部。

上海南京西路1806号（靠近静安寺）在静安证券业务部入驻前是一家理发店，这里很小，小得不如百姓家的一间客厅，墙上的小黑板还没来得及写上仅有的两只股票的名称（另一只为延中实业），刚刚打造好的柜台还没有成为交易柜台，要说这里是个交易场所，未免太寒碜了。凡尔霖踏进这间小屋，恭恭敬敬地将“周芝石”的股票递进柜台，希望给他过户，并幽默地说：“该收多少手续费，别客气！”在场的人都笑了。为表示友好，营业部免收了1元过户费。凡尔霖先生连声道谢说：“中国好，不像我们美国人光认钱。不过今后你们要买美国股票，要过户，我可不能给你们免费啊！”客人的幽默又使在场的人轰然大笑！过户后，凡尔霖先生观看了这间12平方米连厕所都没有的营业厅。工作人员见这个高个子美国人转不开身，不好意思地说：“对不起，我们这儿实在太小了！”“这里比我们初创时要好多了，毕竟有一间房子，而纽约交易所最早是在一棵梧桐树下进行交易的。”面对主人的歉意和难堪，约翰·凡尔霖热情地说，并要求与上海静安证券业务部经理黄贵显合影。客人是真诚的，他意识到中国是一个巨人，这个巨人开辟任何一个市场都将是巨大的。他把带回去的中国第一张股票和“当代最大证券交易所主席和最小证券交易所经理”的合影照片，挂在了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墙上。

“中国改革已跨到了股份公司和证券市场的时代。”当海外的媒体就此事热切报道时，国内的新闻界却反应平静，甚而难见报端。然而上海毕竟有过“东方金融中心”的过去，一些“老上海”在解放前是玩过股票的，即使没有玩过，他们也会记得茅盾《子夜》和曹禺《日出》里，描写的那种“投机性”玩意儿。所以不管媒体和经济界如何反应麻木，敢于吃螃蟹的还是大有人在。

这只“螃蟹”是在约翰·凡尔霖来访两年前出现的。即1984年的11月，由上海飞乐电声总厂提出，经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批准，向社会和本企业职工发行股票50万元，每股面值50元，这笔社会资金是用来筹建上海飞乐音响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飞乐音响”）的。其实在1984年的7月，上海颁布了一个地方性法规《关于发行股票的暂行规定》，已经做好了发行股票的前期工作。但人们对这个法规根本没有注意。同年11月，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批准中国工商银行上海信托投资公司静安证券业务部，来向社会发行飞乐音响股票。这条消息在国内的许多报纸根本不予报道，报道的也都放在无足轻重的位置上，但“墙内开花墙外香”，路透社记者马克·奥尼尔从北京向国外发出了这条爆炸性的新闻后，这条不足500个英文单词的新闻，引起了国外媒体的广泛注意，争相在醒目的位置刊登，《美国之音》、《日本经济新闻》、《朝日新闻》等重要媒体把这则信息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重大突破，进行了详细报道，日本野村证券的社长甚至为此急切地约见了当时静安证券业务部的经理。

新中国的第一批股民，是从国内小报纸的缝隙间或收集国外信息的《参考消息》中了解到，一个改革开放后的新事物即将诞生的。1984年11月18日，上海一个最寒冷的冬天，凌晨3

点，他们冒着凛冽的寒风，在南京西路靠近静安寺的一间 12 平方小屋的门前排起了长队，以此来迎接新事物的诞生，这种只有在“文革”时期的菜场门前才能见到的，半夜排队情景，居然在 80 年代又一次出现在上海滩，这就是新中国第一批抢吃“螃蟹”的人。在冬天的寒风中，他们整整站了五六个小时，8 点钟证券业务部一开门，不到 6 个小时，32.5 万元飞乐音响股票被抢购一空，这情景让抱着“如今有谁堪摘”之忧的发行者深受感动。

总共 1 万股，而个人股只有 6500 股的中国第一片“梧桐叶”或许太渺小了，小得无声无息，令人难以寻觅。

给“老虎”建立一只笼子

说起改革开放后的新生事物，或多或少和中国海岸线南端的 200 多万（常住人口只有 40 万，其余为流动人口）年轻人有联系，1979 年在进入香港的罗湖口岸边的一个小村庄，迎来了 200 多万极具冒险精神的内地青年移民，一个现代化的移民城拔地而起。深圳以经济特区的身份迅速形成一个与香港对峙的新兴城市，到这里来开拓事业的冒险者，以领先的经济头脑和敢为天下先的勇气，为全国探索着一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道路，他们提出“时间就是金钱，效益就是生命”的口号，在当时振聋发聩，他们吸引外资的速度和力度，令内地惊奇，“深圳效率”成为快节奏的现代生活的代名词。

不过这些市场经济的先驱者，在向一水之隔的香港学习借鉴时，不会不看到股市在这个自由港的巨大作用。工商业的筹资渠道、企业风险的社会化、吸引社会闲散资金和国际金融资本、调节经济的手段等等，这些股市的重要经济功能他们不可能视而不

见 而最令他们羡慕的 恐怕还是股份制企业的生机与活力。

1983年7月深圳农村，一家被称为“稻田里的都市”的企业诞生了，宝安县联合投资公司，名称听起来与股份制并没有什么瓜葛，但它是国内第一个以股份合作的形式出现的公司，公司从工业、商业到房地产、酒店和服务业，样样经营，它的注册资金除了国有资产外，大部分来自于宝安县村民们的个人投资，按股份多少分享税后利润。直到1991年上市时，公司才起用一个名副其实的名字“宝安企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安”），宝安公司的出现吹响了国内股份制改革的号角，此后在上海、沈阳、武汉相继出现了一大批股份化改造的公司，以企业职工和法人单位参与入股的公司。深圳占据股份制改革排头兵的地位并非在于宝安为天下之先，而在于其数量之多，到1986年，据不完全统计，深圳特区的股份制企业至少在80家以上，而全国至1986年底，各种类型的股份合作企业也已发展到7000多家，通过股票集资额达到60亿元。面临这种迅猛发展的势头，1986年，经中央、国务院批准，把深圳正式确定为股份制改革试点城市。

股份制改革的重要性，我们可以从1988年6月21日，上海召开的“股份制理论与实践研讨会”上，窥见一斑，会上来自理论界、经济界的专家们进行了激烈的思想碰撞。他们提出一个命题：产权空位。全民所有制的财产既属于全体人民，大家都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谁都是所有者，也就谁都不是所有者，即不属于每个具体的人，全民所有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已，所以没有具体的人会替这种产权负责，公有制实质成了无人负责制，这就是“产权空位”。产权空位导致的结果是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国有法人形同虚设，企业股份化不仅使产权明晰，而且使企业具有社会化的透明度，整个社会将参与

对企业的监督，股份制改革无疑是当时解决产权空位的最有效方法。

而股份制改革，到 80 年代末，已是十分紧迫的事了。1989 年下半年，中国国民经济突如其来地受到强烈冲击。在城市，市场疲软，产品恶性积压，资金奇缺，生产急剧滑坡；在农村，一些农民们交售完指令性计划内的农产品后，拿到的不是现金，而是一张张赊账的白条。当时的国务委员兼财政部长王丙乾向全国人大报告，1989 年财政支出 3014.55 亿元，财政收入 2810 亿元，国家财政赤字运行，而 90 年代又是还债高峰期，400 亿美元的外债，800 多亿元人民币的内债都将到期……

一方面，因为产权空位，企业效益低下，产品积压，纷纷陷于困境，各方要求增加贷款的呼声日益高涨；另一方面是财政赤字，政府不得不紧缩银根。那么启动市场和生产需要加大投入资金，资金从哪里来？即便有资金，政府是否敢于投入这些效益低下的企业？

同时，另一种比市场疲软更大的危险正在走近，1988 年夏季全国刮起了一股抢购风潮，老百姓一夜之间扑进银行，纷纷提取现金，疯狂采购日用品，仿佛世界大战即将到来，通货开始膨胀，给市场造成极大的破坏，为此专家们注意到老百姓手里的巨大购买力。1989 年据有关方面统计，全国城乡居民的银行储蓄存款与手持现金，其结余购买力是 7500 亿元，这个购买力的 20% 就能把当时的市场扫荡一空。如果没有投资渠道，一旦这些钱涌进消费领域，后果难以设想，专家们忧心忡忡地把老百姓手里的这笔钱看作是关在一只虚拟笼子里的“老虎”，一旦风吹草动产生银行挤兑，“老虎”势必出笼。

在这种形势下，给企业开辟新的融资渠道，给“老虎”建立一只新笼子，就成了紧迫的任务，政府没钱贷款给喘息维艰

中的企业，不等于老百姓没钱，要让老百姓的钱投入企业，就得让老百姓成为企业的“老板”，而要达到这一目的，只有对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革。可见中国的改革已被“逼”到了股份制的门槛上了。

深圳作为全国股份制改革试点城市，面对雨后春笋般冒出来的股份制企业，建立股票市场就成为迫在眉睫的事。然而这个平均年龄只有26岁的城市，除了少数专家外，市民们对“股票”一词闻所未闻，没有市民的理解和参与，怎么发行股票？当时全国流行着“深圳速度”这样一句口头禅，可这次作为股份制的试点城市，却眼睁睁地看着中国的第一片“梧桐叶”飘落上海滩头。

深圳的第一片“梧桐叶”是由6家银行信用社通过股份化改造，组建成的深圳发展银行（以下简称“深发展”）。其首期向社会发售人民币普通股79.5万股。或许是为了急切地追赶上海，深圳再也没有耐心等待市民们了解股票为何物，再也没有耐心等待梧桐树长出叶子，自行飘落，他们拿出“做了再说”的深圳式勇气，画了一片“梧桐叶子”，让她飘在股份制改革的前沿阵地上：深圳发展银行连股票还没印出来，就开始发行股票了，他们给股东们发放的是“收款收据”——一张虚拟的“梧桐叶”。

这张虚拟的“梧桐叶”悄然飘落时，已是1987年5月，比上海整整晚了两年半。10个月以后，即1988年3月，股东们才用“收款收据”换到真正的“梧桐叶”。

股份公司的“正规军”

1988年12月28日，深圳街头出现一帧巨大的横幅：“移植

香港经验，隆重推出万科股票。”市民们对此并不兴奋，而只是好奇，更好奇的是前一天，即12月27日，深圳的党报《深圳特区报》，以整版的篇幅，刊登了深圳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科”）的《招股通函》。为什么党报对万科股票的发行，如此大张旗鼓地支持？这引起了部分市民的关注，有人甚至投信报社，提出各种各样的责问，最严厉的责问恐怕就是：“党报怎么能整幅版面刊登‘商业广告’，大有兴师问罪之意。为此报社刊登了一位女读者的来信《对“万科”发售股票提几个问题》，同时在两天后，即1989年1月11日，让万科股份制筹委会在报上公开答复读者提问。从中我们可以看出端倪，深圳发行股票不得不依靠政治影响力。

我们知道，深圳发展银行并不是中国首家股份制银行，1986年7月，经国务院批准成立的交通银行，才是真正第一家股份制银行。交通银行是全国性的银行，其资本金由国家控股50%，另外50%公开向社会各界认购，每股500元，个人最多认购20股。然而毕竟交通银行至今都没有成为上市公司，所以从中国股市的角度，无法与深发展相比，深发展这家以后在深圳股市举足轻重的股份制银行，其诞生可说是新中国金融史上的创举，它不仅是首家上市的金融股份公司，而且还是首家拥有外汇优先股的中国银行。

与深发展相比，万科的重要性更为突出，其意义并不在于它是深圳第二只发行并上市的股票，而在于它是国内第一家完全按照国际规范改造成的股份制企业，在于它是国内第一家具有外资股的股份制工商企业，同时它还是新中国第一家严格按照上市公司标准规范运作上市的公司，从公司情况、财务报表到股本结构、利润预测，全部向社会公布，完全以透明的方式出现在投资人面前。它代表着股市“正规军”的出现，代表着深

圳乃至全国的股份制改革上了一个新台阶。

万科的前身是深圳现代企业有限公司，这是一家成立于1984年，性质属于全民所有制的企业，在股份制改造前具备了一定的规模，下属有15家全资、合资、直管企业，在北京、广州等地都设有分公司。以王石为总经理的万科，云集了一批二三十岁的青年知识分子型企业家，当公司决定进行股份制改造时，小伙子们提出“要干就干出一个符合国际规范的样本来”，总经理王石想得更远，他决定在股本结构中设外资股，于是公司安排小伙子们赴美国、德国、英国、法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对先进的股份公司进行学习考察，并请来了当时作为深圳市政府金融、证券顾问公司即香港新鸿基公司主席冯永祥先生，进行实际指导。

在订公司章程时，万科公司担心能不能得到外商的认可，所以广泛征求外商意见，坦诚地承认目前国内有关立法、制度不健全，然后共商如何使其章程既能符合国际惯例，又能弥补法制方面的不足。经深圳蛇口会计事务所核定，确定国有资产的价值，设置国家股的份额后，最后在通过产权重新界定的基础上，实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彻底分离。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股份公司就这样诞生了。

很显然，万科的发行不能像深圳发展银行那样，向股东们开“收款收据”，必须完全正规化，按香港规范上市操作的标准，发行时必须在当地报纸上公开刊登《招股通函》。可当时不要说深圳，就是全国都没有一份证券方面的专业报刊，深圳最大的报纸是《深圳特区报》，但这是党的机关报，能在党报上大版面地登商业通函吗？万科公司心里没底，他们找市委负责同志汇报情况，没想到市委全力支持，当即开了绿灯，当《深圳特区报》上出现万科公司的大幅《招股通函》时，市民

们感到惊愕，港澳地区的观察家们则赞叹不已，由此猜测国内的党和政府大力支持股票发行的坚定决心。

香港《文汇报》于1988年12月10日和12月28日两次发布深圳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向外资售股的消息后，报社电话不断，海外公司及人士纷纷打听万科的情况以及如何购买公司股票，反应十分强烈，香港《文汇报》为此急派记者到万科了解情况，并很快以“深圳现代企业实行股份制经营”为题，在香港《文汇报》经济新闻版发表专题介绍该公司的文章。此外日本的《经济新闻》周刊对此刊发了一系列的报道消息。国际金融投资方面的著名记者，英国《环球投资者》助理编辑julie女士专程来深圳采访万科，称这是中国与国际接轨的一大重要举措。

首期拟定以全部股票的24.9%向境外发售外资股，近1000万股（折合人民币约1000万元），外资股刚发行就被认购一空，《深圳特区报》1989年1月26日报道，认购万科股票的有日本索尼、日中规则株式会社、新力公司、香港天安中国有限公司、仁达国际有限公司、联大企业公司等14家海外公司，外币认购额达1050万股，超过原定不超过25%指标，为此“万科公司正与外资方及有关部门商议处理办法”。

然而在国外投资者踊跃认购时，深圳市民却对此漠然置之，根本不为所动，万科股票和深圳发展股票的发行，非但没有产生上海滩抢购一空的情景，而且无人问津，似有“连城不值一羊皮”的凄凉。

股票和政治觉悟

1987年，为了深圳发展银行股票的发行，廖熙文，一个贵

州遵义人，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毕业的高材生，受命筹建深圳经济特区证券公司，他在深圳红荔路租了一间15平方米左右的房子，和几个同仁开始了深圳最大的证券公司的创业。深圳证券公司的营业面积比上海静安业务部大3个平方米，但他们遇到的困难可能是上海的同行无法想象的。上海的第一片“梧桐叶”还有一批老人排队摘取，可深圳人对股票的知晓差不多是零，不要说排队，就连上门推销都吃闭门羹，“股票？什么东西？”这是推销人员听到的最常见的话。结果可想而知：不要！

深圳市政府面对这种尴尬的局面，发起了有声有色的宣传活动，可不管是宣传机构多么热切地把1987年称为深圳的“股份年”，还是舆论界把深圳发展银行发行股票推为1987年深圳的10大新闻之首，市民们却不认识也不认可这玩意儿，尤其是70年代从政治的忧愁风雨中过来的中年人，总觉得这种政治式的“叫卖”是“跣行仁义孔丘非，殇乐长年老彭悲”。股票没人要，刚刚成立的深圳证券公司一时间陷入交不起房租，付不起水电费，发不出工资的生存困境。发行受阻，就更谈不上建立股市了，没有股市，股份制改革将无法推行下去。

有一根神经中国人一直是相当发达和敏感的，这就是政治神经，尤其是那些经历过长期政治运动时代的人们，不管是讨厌还是热衷，即便在当时经济最为开放的深圳，市民的政治热情依然十分高涨，把买股票和政治表现联系起来，说来非常滑稽，却行之有效，想出此招的人肯定是深谙中国国情的天才。深圳市政府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深圳市委书记首先掏腰包买股票，号召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党政机关领导干部身先士卒，以市委书记为榜样，掏钱带头认购。既然市政府动员号召，各单位领导干部带头，一些有觉悟的党员群众紧紧跟上，一时间

买股票成了一种政治思想表现，成了有政治觉悟者以实际行动支持深圳的改革，在他们看来，这是帮助政府解决改革阶段遇到的资金“困难”。

那些政治觉悟不高、却又害怕给领导留下坏印象的群众，面对上门推销人员触霉头地感叹一句：“又来搞摊派了。”他们没好气地当面买下一张，顺手扔进废纸篓，并自慰道：“权当做个人情。”也有个别单位的领导对推销人员一个劲地哭穷，只是象征性地买下100股，也算是响应了“政治号召”。那时一些生性胆小的知识分子，一听到是“政治任务”赶紧掏腰包，后来到沾股即富的年代，他们真是发了一笔。

就这样，深圳诞生了第一批股民，这是由深圳政治素质最高的人组成的，不过他们把手上的股票看作一张存单，当作国库券的一个新品种。反正借钱给国家，帮助国家解决困难，国家总不会让我们吃亏的。一些并非自愿，却又不愿意被单位同仁视为落后分子的群众，拿着股票，心里确实是这样想的。

市政府、发展银行、证券公司，在“政治觉悟”的感召下，在踏破铁鞋、登门推销的努力下，勉强发行掉额度（总额度为79.5万股）的49.9%，还有一半多的发展股票只好存放在证券公司了。这当然使得许多人后来大发“今是而昨非”的懊丧。

虽然举步维艰，可股份制改革却是坚定不移的。1988年11月26日，深圳市政府召开“企业股份制改革工作会议”，会上副市长朱悦宁对1989年推行股份制作了具体部署，市长李灏指出：“国营企业推行股份制是个总趋势，是企业改革的主要方向。”

为了配合改革的深入，舆论界一厢情愿地把1987年指定为深圳的“股份年”，可1987年股票发行困难。随后指定1988年

为“股份年”，然而“股份年”还是没有到来，与其说市民反应麻木，不如说市民毫无反应。在深圳等待中国股市兴起的，不是第一批买了股票的股民，而是深圳的党政领导，深圳的企业家，深圳股份制改革的带头人。

白天的喧嚣到来前的黎明，格外的静悄悄，可谁敢说深圳的股票会在静阒中流产呢？而在上海，这黎明前的死寂同样令人惶悚不安，或许是在考验上海第一批股民的忍耐力，他们抢购回来的飞乐音响股票，如同银行长期存款凭证，在差不多两年的时间里根本没有市场可以转让买卖，也根本谈不上分红派息。1985年1月，上海第二只股票，上海延中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延中实业”）股票在上海静安证券业务部发行后，也同样经历了等待的命运。股民们在等待，领导层在研究，专家们在讨论。

1986年，当时任上海市长的江泽民同志亲自召开座谈会，专家们终于把股票到底是姓“社”还是姓“资”的问题搁置起来，正式批准为“飞乐音响”和“延中实业”这两只中国最早的股票建立交易市场。

1986年9月26日，上海的“一小撮”股民们，等到了一个中国证券史上划时代的日子，上海工商银行信托投资公司静安证券业务部（后来更名为上海申银证券公司），设立了解放后第一个股票交易柜台，并在静安寺边上12平方米小屋的小黑板上，工工整整地写上了延中实业与飞乐音响股票的交易价格，从此拉开了新中国股市的序幕。

一年半以后，在南海之滨股份制改革的前沿阵地上，深圳发展银行，通过深圳证券公司，正在把第一批股东的“收款收据”换成正式股票，同时发放了1987年的股息，这是中国股民第一次享受到股份公司的利润。一个月之后，即1988年4月，

深圳证券公司在红荔路15平方米“交易所”的柜台上，将只发行掉一半不到的深圳发展银行股票挂牌上市了，同时也宣告筹备一年的深圳证券公司正式成立，深圳股市在举步维艰中也拉开了序幕。

至此，上海和深圳股市的幕布均已拉开，然而舞台空荡荡的，登台者寥寥，据当时香港《信报》的报道，上海自发行和上市转让股票以来，市民反应“极为麻木”，“观望者居多，投入者寥寥。投资者主要是擅长此道的老年人，为数甚微”。没有大众参与的市场是虚拟的市场，中国的股市依然在等待，等待人们摆脱传统观念，等待人们摆脱把股票当作资本主义“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剥削工具的片面看法，等待解放后出生的人们认识股票这种新生事物，等待新中国股份制时代的真正到来。

80年代的中国股市，可以说是世界最小的，也是最不起眼的，但股市是神奇的，正如在一篇报告文学中描写的那样：“它像一个被海盗掠到天涯海角的孩子，在母亲揪心的记忆中，它永远是被怜悯、被挂念的对象。可是，长夜过后，母亲打开门缝，看见守在门旁的它已是一个腰缠万贯、衣锦还乡的阔少爷了！”

第二节 “炸弹”是怎样爆炸的

静穆中耕耘出静安指数

自1984年底发行了第一张股票后 发行这张股票的上海工行信托投资公司静安公司经理黄贵显与他的同事们，就开始策划建立柜台交易。1985年9月正当他们酝酿让股票流通时，《经

济新闻报》的记者把消息捅了出去，于9月24日在报上发表了题为“全国第一家股票交易市场将开业 静安信托公司经营股票买卖延中实业公司股票被批准上市”的报道。但当时建立股票市场的时机并未成熟，静安信托公司酝酿开辟股票交易没有得到管理层同意，为此黄贵显还写了检讨。直到1986年8月，当时的上海市长江泽民同志召开上海有关部委办负责人会议，在听取了有关股份制情况汇报后，才决定开辟股票流通市场，于是静安信托公司定于1986年9月26日正式启动中国股票的柜台交易，据说正是去年的这一天，经理黄贵显因“冒进”而向上层领导递交了检讨书。

有了市场并不等于有交易，有了交易也并不等于股票交易，人们说买股票就是买公司的未来，然而1988年的中国股票交易，不要说买公司的未来，就是买公司的现在都谈不上。

上海飞乐音响发行的6500股流通股，每股面值50元，延中多一点，发行的10万股中有94%是流通股，面值也是50元，于是这两只股票在上海静安证券交易柜台上，价格就一直在50元附近波动，几度还跌破面值，由于许多人把股票当作存单，锁到箱底去了，所以交易量极度萎缩。恐怕股票的价格与公司的业绩、公司的资产增长有什么联系，是那时的股民想都没想过的。

正是在这样的冷清和静穆中，却有一批耐得住寂寞的证券从业人员在默默耕耘。新中国第一个股价指数——上海静安指数和边晓敌这个名字是分不开的。这是个在黑龙江农场插过队的上海知青，1979年回沪后进上海工商银行静安支行教育科工作，负责电视大学的教学。完全是一个偶然的时机，因为静安支行与发行股票的静安营业部有业务来往，使得他与静安营业部经理黄贵显认识，1986年7月要建立柜台交易，所以黄贵显

把他调去参加柜台交易的设立。当时搞柜台交易的只有一位叫功荣泉的老职工，虽然交易清淡，可全是手工操作，从小黑板上写牌价到填写交割日期，从登记卡号到盖章过户，而且所有的计算都是靠拨算盘珠子，所以工作又累又繁琐，堪称新中国首位红马甲的功荣泉，在柜台交易建立后不久，因过度劳累染病去世了，这样柜台上就留下边晓敌一个人顶着。

边晓敌不仅工作认真，把每天的交易仔细地记录下来，而且买了许多国外关于股票方面的书，进行钻研。他发现国外的股市都有指数，美国的道·琼斯指数，英国的金融时报指数，日本的日经指数，香港的恒生指数。所以在1988年初，他根据自己记录的一本股票交易统计的原始账本，开始设计我们自己的指数，他几乎参考了所有国外指数的编制方法，没日没夜地工作。这时在日本蓝泽证券公司研修归来的阚治东先生，开始负责静安营业部的工作，并主编全国第一份《股票年报》。他对边晓敌的研究成果十分重视，亲自对这个指数进行修订完善，最后定名为静安指数，公布在《股票年报》上。

静安指数以1987年11月2日为基期，所选的股票是当时上海上市的所有股票，取用的不是每天的开盘或收盘价，而是当日的平均成交价。这个指数推出后，虽然在1988年到1989年两年间一直在100点上下20%的幅度内波动，而且是世界上反映股票最少的指数，但国外的媒体还是承认它的价值，当时香港报刊报道说：“反映上海股市行情涨落仅有的静安股价指数，成为市民们判断股市的晴雨表。”现在静安指数已不再使用，但作为新中国股市的第一个股价指数，和新中国第一批证券从业人员一样，应该为后人记取，尤其是证券业如火如荼的今天，我们不应该忘却他们在无人问津处境中的艰难创业，“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